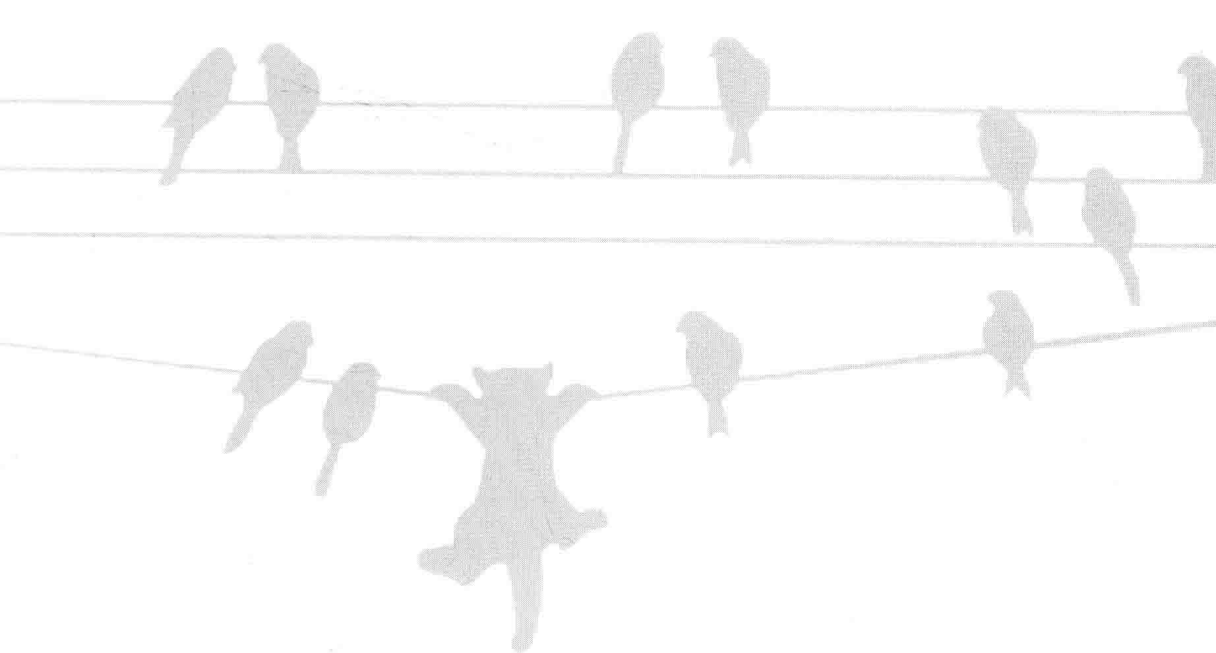


认知心理学视角下的 会话理解

Perspective taking in conversation:
a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account

郑小蓓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认知心理学视角下的 会话理解

Perspective taking in conversation:
a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account

郑小蓓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知心理学视角下的会话理解: 英文 / 郑小蓓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 - 7 - 5161 - 8839 - 2

I. ①认… II. ①郑… III. ①英语—语言交流—研究②英语—代词—研究 IV. ①H319. 9②H314.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0510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刘 艳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239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所报告的科研项目得到过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CSC）的大力支持，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深圳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科研基金的全力资助（项目号：801），特此鸣谢。

序 言

会话是人类日常生活中普遍而重要的行为，从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到借助电话、电脑等工具的语音或视频交流，会话时刻发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研究角度看，会话研究涉及社会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多个学科；在研究内容上，会话研究涉及社会价值、心理加工和言语分析等多个层面；在研究方法上，会话研究可采用问卷调查、语料分析和认知实验等多个手段。根据不同的研究需求，对会话言语行为的研究可分为言语的生成和理解两部分。其中，心理学较多地关注语言理解，因为相对于语言生成，语言理解更易于规范化和量化。

在认知语言学视角下，会话建立在一系列紧密联系的认知加工之上。首先，人们需要区分什么声音是语音，什么声音不是语音，并不是人类发出的所有声音都属于语音。其次，人们需要根据一定的组合规律，将语音与意义相联系，并通过句法分析来整合句子的意义。然而，理解了句子中的每一个词的意义，并不代表能正确地理解整个句子的意义，“语境”（context）这个因素在话语理解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广义上来说，语境包括语言上下文、会话发生的物理环境，以及对话者的知识等丰富的信息。一方面，语境能够帮助人们准确理解指示性的词语。例如，“把它拿起来”，“它”所指代的信息并不足以令听话者理解说话者要表达的内容，但结合当前的对话情境“对话者正在谈论某物体”，这句话的指示意义就变得简洁易懂了。另一方面，说话者表达的字面意思往往不是其实际的含义，例如，“你很好”，这句话既可能是赞扬对方，也可能是讽刺对方。语境既能够协

助说话者表达隐含的意义，又能够协助听话者确定说话者真实的想法。简言之，语境的作用很广泛，它可以补充句子的明确意义，将句子的表面含义和深层含义进行区分，语言的理解离不开语境的支持。

本书开篇简述了传统语用学理论怎样解释语境在语言理解中的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语用学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格赖斯原则（Grice's theory）、新格赖斯原则（neo-Gricean theory），以及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格赖斯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认为“会话的发生符合对话者交谈的公认目标或方向”（Grice, 1989: 26），并进一步列出了数量（Quantity）、质量（Quality）、关系（Relation）和方式（Manner）四条准则，以阐释说话者如何有效地提供信息，以及听话者如何准确地理解信息。新格赖斯原则将部分格赖斯原则具体化，比较重要的有 Levinson 的会话含义三原则，即量原则（Q-Principle）、信息原则（I-Principle）和方式原则（M-Principle）（Levinson, 2000）。Sperber 和 Wilson（1986）的关联理论将重心转移到对人类心理机制的探讨，强调认知的作用，并提出了认知和交际两大原则。认知原则（Cogniti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认为人类的认知倾向于同最大关联相吻合。交际原则（Communicati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认为交际行为都应该设想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与格赖斯理论不同的是，前者认为人们在会话中存在一些预期，这些预期包含对准则的遵循。但关联理论更多的是描述而不是规范人们的会话预期。

无论是格赖斯原则、新格赖斯原则还是关联理论，都是站在哲学的角度探讨语言的使用，通过对自然语言的分析来建立和论证理论。尽管这些方法都采用严密的逻辑论证，但也正是因此，各理论都得到很好的验证，理论间的争论反而难以得到最终解决。因此语用学家一直试图寻找一些更为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这些理论争端，并开始关注实验心理学这一领域。

实验心理学是利用实证研究方法来研究心理现象和行为规律的一门学科。事实上，实验科学早已被引入语言学研究，并形成了一个跨学科领域——心理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主要运用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方

法研究语言活动中的心理认知机制，它在语言获得、语言理解和生成等方面都具有丰富的研究历史。然而，心理语言学对语用的研究却非常有限，直到2004年，Noveck和Sperber在《实验语用学》论文集中首次将语用学和实验心理学进行了整合，才确定了实验语用学这一新兴领域，并提出了学科融合的意义。首先，实证研究能够提升论据的可靠性，更加科学地验证理论假设。其次，实证研究也会对理论发展起到完善和明确的作用，相比之下，以往建立在直觉解释之上的理论定义往往比较模糊。

实验语用学采取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其研究的基本模式是建立假设—验证假设—支持或推翻假设。而传统语用学则主要通过对现象的分析来建立和解释理论。在研究手段上，实验语用学整合了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手段，通常采取行为实验、眼动、事件相关电位(ERP)和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等技术研究语言理解。这些技术用于在线(online)研究，能够记录和分析被试的即时反应时间与脑部活动等。而传统离线研究仅能揭示被试的反应正确率或频率。在结果的解释上，实验语用学研究主要建立在统计检验的基础上，其结论可以从有限的样本推广至总体，而传统的观察研究则建立在描述性统计数据之上，其结论会极大地受到样本和随机误差的影响。

那么实验语用学如何考察语境在语言交流过程中的作用呢？如果说传统语用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在语言现象本身，那么由实验心理学发展而来的实验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则主要在人的认知加工过程。例如，实验语用学认为，当会话的上下文帮助对话者理解语言的时候，事实上是听话者对上下文的记忆在起作用。当会话的物理情境影响听话者的语言理解时，事实上是听话者对情境的感知在影响其语言理解。

当然，对上下文或情境单纯的感知和记忆，并不足以确保语言的有效交流。比如，当说话者感知到当前情境下“有一个杯子”，并说“这个杯子很好看”，说话者对客体单纯的感知对于有效地传达句意来说是不够的。首先，如果听话者并没有看到当前情境下“有一个杯子”，他将无法理解“这个杯子”所指何物；其次，即使说话者和听话者同时看到“有一个杯子”，但说话者并不知道听话者看到“有

一个杯子”，他通常会通过语言、眼神、手势等行为对这句话的指示性进行补充；最后，如果说话者和听话者同时看到“有一个杯子”，但听话者并不知道说话者看到“有一个杯子”，他依然无法理解“这个杯子”的所指。综上所述，从哲学的角度看，基于某事件的对话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 1) 说话者知道该事件，
1') 听话者知道该事件；

- 2) 说话者知道听话者知道该事件，
2') 听话者知道说话者知道该事件；

- 3) 说话者知道听话者知道说话者知道该事件，
3') 听话者知道说话者知道听话者知道该事件；
如此进行无限的递推。

上述过程涉及对话者对对方心理状态的推论，我们将其称为会话过程中的观点采择 (perspective taking)，观点采择既是说话者言语生成的依据，也是听话者语言理解的前提。

然而，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看，上述这种无限的递推显然需要耗费无限的认知资源和时间，因此在实际操作上是不可行的。认知心理学家认为，在观点采择的过程中，人们只需通过一些提示性信息建立对情境认知的可能性，而无须建立对情境具体的认知。比如，在上述例子中，对话者并无须递推对方知道自己对当前情境下的客体感知，即看到“有一个杯子”，而仅仅需要确认“对方的眼神与杯子接触”这一事实即可。这一假设在发展心理学领域已经得到大量验证，例如，Tomasello 和 Haberl (2003) 的实验报告了 12 个月的婴儿能够参考当前语境来解释实验者的指示语。Moll 和 Tomasello (2007) 进一步证明，婴儿之所以能够运用语境信息，并不是因为婴儿推论了成人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而仅仅因为婴儿与实验者之间存在联合注意

(joint attention)^①。也就是说, 婴儿通过眼神接触等提示性信息与成人建立联合注意, 即可确保与成人进行有效的交流, 而无须对成人的心理状态进行无限的递推。

但是, 这一假设并没有在成人的语言使用研究中进行过验证, 本书的研究目的则是为该假设提供实证研究证据, 并进一步探讨该理论所依据的认知机制。在本研究中, 我们通过考察对话者对定指 (definite reference) 的理解来验证这一假设。一方面, 对定指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比拟发展心理学研究中婴儿语言理解的研究, 因为大量的婴儿语言理解研究都在探讨婴儿如何解释指代词的所指对象。另一方面, 定指研究能更加清晰地对比和区分对话者的心理认知状态, 包括说话者个人的心理状态、听话者个人的心理状态, 以及二者共享的心理状态。通过操纵说话者对客体的感知^②、听话者对客体的感知, 以及二者共享的对客体的感知, 我们可以验证究竟何种水平的认知加工在理解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本研究开展前, 我们首先对对话者的心理状态进行了明确定义, 即, 此心理状态包括对话者的意图 (intention)、信念 (belief) 和知识 (knowledge) 等信息, 也就是观点采择中的“观点”。其次, 我们需要界定何为双方“共享”的心理状态。如果“共享”的心理状态即双方共同拥有且同时递推对方也拥有的意图、信念和知识等信息, 那么对话者在此过程中需要运用心理理论 (Theory of Mind, ToM)。心理理论是指推论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 包括认知自己和他人不同的意图、信念和知识等心理状态的能力。考察对话者是否对对方进行心理状态的推论, 即是否使用心理理论, 同样可以通过科学实验来进行操纵和测量。

① 联合注意是指儿童和成人通过眼神接触、手势指向和其他语言及非语言指示性行为从而共同注意某物体。联合注意作为早期的社会认知能力, 对儿童的语言、社会认知等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被看作婴儿早期发展的里程碑 (Tomasello, 1995: 104)。

② 对话者对客体的感知可以通过实验操纵形成不同的认知深度。比如, 眼神接触“这个杯子”但没有注意其存在, 或仅注意到“这个杯子”的存在, 或既注意到“这个杯子”的存在且联想到相关的内容等, 分别代表对“这个杯子”不同深度的认知加工。

接下来,本研究明确了理论假设涉及的两部分主题。首先,如前文所述,我们认为无限递推的信息量很大,需要消耗大量认知资源。根据婴儿研究的结果,我们预测会话过程中心理认知的共享状态可以是一个更为简单的成分,无须涉及信息本身的共享,而可以仅共享与信息相关的指示性线索。在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中,婴儿仅仅通过眼神接触等线索建立联合注意,就能够顺利理解成人的指示性语言。在本研究中,我们将这种感知层面的信息共享称为共同基础(Common Ground)^③。其次,递推对方心理状态并不是会话理解的必要条件,而是会话理解的产物。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并不是通过推断对方的心理状态去理解会话,而是通过理解会话去推断对方的心理状态。比如,当说话者说“我的车需要加油”,即使听话者并不知道“说话者有辆车”,听话者依然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并以此推断“说话者有辆车”。本研究认为,观点采择过程中对话双方确实会采用心理理论,即推论他人心理状态,但这种推论并不是传统理论所解释的一个复杂和无限循环的过程。

综上所述,本研究第一部分旨在验证我们对“共同基础”的假设,即,听话者在仅存在共同基础(或联合注意)的前提下就能够顺利理解会话内容。第二部分通过考察心理理论在会话中的作用来探讨传统语用学关于会话过程中观点采择的无限递推理论,即,对话者是否需要无限递推对方的意图、信念和知识等信息才能够正确理解语言。从这个角度看,本书探讨的主要问题包括:在认知心理学视角和科学实验范式下,观点采择的过程涉及哪些认知加工成分,各个成分之间是如何协同运作的。

本书第一章概述了本研究涉及的语用学理论、实验心理学研究方法,以及共同基础和心理理论两大概念。第二章进一步讨论并确立了

^③ 在 Clark 和 Marshall (1981) 提出的共同基础的概念中,共同基础指共享的与会话相关的知识。这一定义更类似于前文阐述的无限递推的模式,即双方共同拥有且同时无限递推对方也拥有的这些意图、信念和知识等信息。在本研究中,我们将这一概念清晰化,认为共同基础更类似于在婴儿中就已经出现的联合注意,而对意图、信念和知识等信息的无限递推则需要运用心理理论能力。

本书对共同基础的定义，由最初 Clark 和 Marshall (1981) 提出共同基础的概念开始，我们讨论了其在哲学和传统语用学视角下的争论和演化，对比了婴儿在语言获得过程中广泛使用的联合注意，并介绍了 Horton 和 Gerrig (2005) 提出的基于记忆的模型 (Memory-based model)。我们认为，基于记忆的模型描述了对话者观点采择的认知加工机制，即共同基础的作用机制。基于记忆的模型认为，人们对语言的加工建立在由说话者的身份引发的相关信息的短时记忆之上。也就是说，对共同基础的加工是一种单纯的记忆联结，对话双方在交流过程中会启动一系列相关的记忆，特别是与说话者有关的记忆。当说话者讲述一段事件时，听话者会自动激活关于事件中和说话者有关的时间、地点以及其他相关联的记忆元素，这些信息使得听话者能够建立与说话者的共同基础。比如，人物 A 和 B 共同完成事件 E，而人物 C 同时单独参与完成该事件。尽管他们三人都知道其他二人也参与了事件 E，但相对于 A 和 C 谈论事件 E，A 和 B 谈论该事件时可能会省略更多的相关信息。这是因为对 A 来说，B 比 C 能更多地激活其对事件 E 的记忆，因为 B 能够为 A 提供更多对事件 E 的感知线索。因此，基于记忆的模型关注的是过去共享的知识信息如何在对话过程中被提取，从而影响听话者的语言理解。

接下来，我们在第三章的实验一和实验二中验证并修正了上述模型，最终确立了共同基础在会话理解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在实验一中，实验员通过电脑向一名被试和一名指导者分别呈现同一个游戏架的正反面，要求被试根据指导者的指令在游戏架上完成图片移动任务，并记录被试接受任务指令时的眼动。坐在游戏架正面的被试既能够看到架子里二人共享的图片，又能看到自己独享的图片，而坐在游戏架反面的被试仅能看到二人共享的图片（详见第 72 页）。实验考察了当任务指令中的定指既可能指代二人共享的图片，也可能指代被试独享的图片时，被试是否会参考对方的视角，忽略独享的信息，最终选择双方共享的信息。通过对被试在理解定指时的注视点分析，我们发现，被试在语言理解的早期并不会考察信息是否共享，其语言理解仅仅依赖信息在感知层面的显著程度。具体来说，对于受到强化，

且与自己有更深层联系的信息，被试的提取过程会变得相对容易。在自然对话中，这类信息往往是对话双方共享的信息，因为只有通过共享的信息，听话者才能将其与说话者联系起来。通过实验，我们可以操纵信息的共享性以及信息与对话者的联系。我们发现，即使信息不共享，如果其与说话者存在关联，那么这种信息同样会影响听话者的语言理解。这一发现修正了传统理论中语言交流需要建立在信息共享基础之上的假设；同时验证了本文的假设：对话者并不需要推论对方的心理状态，即，不需要进行前文所述的递推，仅仅低水平的感知关联就足以协助听话者进行语言理解。

实验一的结果显示，感知线索仅在特定条件下影响语言理解。具体来说，被试能够将说话者的身份信息作为记忆提取的线索，但不会将会话发生的物理情境作为线索。我们认为，在此实验中，说话者的身份信息在会话过程中是共享的。但由于对话者在实验过程中处于不同的房间，情境信息并不是共享的，因此我们对基于记忆的模型提出了改进。具体来说，只有共享的线索才能够得到对话者更多的注意，并进而引发其更深层的记忆。换言之，相比那些不被共享的线索，共享的线索会在认知上产生更深、更重要的信息激活。通常来说，人物身份与物理情境相比，就是一种更显著的线索。这是因为人作为会话的参与者，一直处于联合注意的状态下。正是这种联合注意加强了人物身份的显著性。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对物理情境等线索的加工也存在联合注意，它们是否同样能够协助对话者进行语言理解呢？由此，我们进行了实验二，并在此实验中操纵了对话双方是否联合注意对话者与物理情境的联系。实验二采取和实验一相同的游戏程序，但在被试移动物体前，双方进行了短暂的关于共享的物理情境的对话，以此加强对话者与物理情境的联系（详见第96页）。结果表明，一方面对话者确实能够将物理情境作为线索激活相关的记忆；另一方面唯有对话者对情境线索存在联合注意时才能激活相关的记忆。综合实验一和实验二的结果，我们证实了基于记忆的模型，认为对话过程中的观点采择是一种自动化和低水平的加工。对话双方在共享注意的前提下，仅

需激活记忆中的相关信息便可进行会话理解。

与实验室条件下取得的结果不同，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观点采择困难的案例（例如，Keysar et al.，2000）。比如，当对话者在讲述一段对话双方都曾各自经历但没有共同经历的事件时，听话者可能利用自己的知识体系来过度揣测对方的语言，说话者也可能在表述过程中出现表述信息过多或信息不足的现象。这些现象很难用单纯的自动化感知加工来解释。那么是否如前文所述，观点采择确实需要心理理论的作用呢？如果需要，会话过程中心理理论的运作机制又是怎样的？是否如传统理论所说，对话者需要进行对对方心理状态的无限递推呢？我们在本书第四章中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本章首先综述了以往观点采择的实验研究。这些研究既报告过观点采择的快速、自动化加工，也出现过观点采择的滞后和困难。其中，基于限制的模型（Constraint-based model）（Hanna et al.，2003）和 Brown-Schmidt 于 2012 年提出的共同基础的梯度模型（graded saliency）都能够模拟人们在会话理解的早期如何快速成功地进行观点采择。相比之下，观点调试（Perspective-adjustment model）（Keysar et al.，2000）和预期整合模型（Anticipation-integration model）（Barr，2008）都解释了观点采择的滞后性。我们认为这些研究的问题之一是并没有将共同基础和心理理论区分开来，而仅仅提到了共享知识（shared knowledge 或 common knowledge）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些研究并没有明确指出共享知识的提取是基于低级感知加工还是基于对话者的心理理论推论。我们在本研究的实验一和实验二中已经发现，在对话加工的早期，人们可以不进行心理理论推论，而只需要利用感知线索就能够建立起共享知识。这就从特定维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有些情境下，即便对话双方对共享的知识有明确认识，依然很难进行观点采择。原因即在于虽然对话者使用了心理理论对对方的心理状态有了明确的认知，但这种认知和低级感知获得的信息之间发生了冲突，从而导致了观点采择的滞后现象。

基于上述发现，我们首先对共同基础和心理理论进行了进一步区分。如本书第二章所述，共同基础是通过感知水平的信息联结，快速

自动地激活人们的相关记忆。而心理理论是对话者通过对对方的意图、知识等信息进行推论，将对方和自我的信息进行区分，进而选择提取共享的信息。我们认为，观点采择的滞后和困难并不单纯缘于记忆激活的失败或心理推论的失误，而是缘于心理理论和共同基础之间的冲突。当共同基础和心理理论存在一致性，即，听话者利用共同基础激活的共享信息与利用心理理论推论的共享信息一致时，观点采择将会迅速且自动地完成。而当共同基础和心理理论相悖，比如，对话者错误地借助情境激活了共同注意却不被共享的信息，或错误地推论了对方的认知状态，就会造成共同基础和心理理论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对话者需要考察更多的信息来加工会话，从而造成观点采择的滞后性。

在第四章结尾，我们介绍了 Brown-Schmidt、Gunlogson 和 Tanenhaus (2008) 的研究发现。这是一项讨论对话者如何使用心理理论进行会话的有重要影响力的研究。但此研究没有使用观点采择实验范式，也没有进一步区分在此过程中共同基础的作用，因此我们设计并实施了第三个实验，旨在通过经典的视觉—世界范式 (visual world paradigm) 来考察对话者对心理理论的使用是否影响其观点采择。

在实验三中，我们依旧采用前两个实验的任务，但是在任务开始之前被试和指导者会针对被试独享的信息开展一段会话，通过操纵会话内容，被试会形成两类心理理论的判断。一类是高估对方的认知状态。比如，指导者通过要求被试在计算机上完成信息判断任务，使被试误认为指导者知道计算机提供的被试独享的信息内容。另一类是更明确对方的认知状态。比如，指导者通过向被试提问，使被试确信指导者不知道问题涉及的相关信息 (详见第 157 页)。我们发现，当被试高估对方的认知状态时，他们倾向于在后来的会话中错误地激活自我的知识；而当被试确信对方的认知状态时，他们相对更少激活自我的知识。与以往观点采择研究不同的是，这一实验控制了对话双方共享的知识信息，即，在保证共同基础一致的情况下，验证了被试在观点采择的过程中确实会使用心理理论。

我们还发现，心理理论的作用发生在观点采择加工的早期，几乎

与定指的生成同时出现。这说明对话者对心理理论的使用应该并不完全等同于前人提出的“无限递推”，因为无限递推是不可能如此快速地被完成的。简言之，实验三验证了我们关于观点采择加工需要心理理论支持的假设，发现了心理理论运作的迅速和高效性，并再次反驳了观点采择过程中对话者需要对对方心理状态进行无限递推的传统假设。

基于上述发现，我们进一步提出了观点采择滞后的另一种可能性，并在实验四中进行了验证。在经典的观点采择研究范式中，对话者不仅共享定指所指代的客体，同时还共享一个事实，即，听话者自我的知识也属潜在的指代对象。具体来说，在我们的实验中，对话双方讨论如何在屏幕上移动卡片。尽管双方都知道有一部分卡片并没有在说话者的屏幕上呈现，但是双方都知道这部分卡片的存在。也就是说，尽管说话者不具备对某客体的认知，但是当该客体的存在是双方共享的信息时，对客体存在性的认知状态也会影响会话的判断。我们还认为，这类影响方式正是在本研究第一部分中提出的低水平感知的作用。

实验四特别操纵了对话者对客体存在性的联合注意。实验采取类似的游戏任务，在第一种条件下，对话双方针对游戏图片进行了讨论，从而建立起对图片存在性更深的认知。在第二种条件下，对话双方不针对游戏图片进行语言讨论，但联合注意等线索依然会激活对话双方对客体存在性的认识，从而建立起对客体存在性的共同认知。在第三种条件下，对话者被分配到两个房间，在对话过程中无法建立眼神、动作等语言之外的交流。也就是说，客体存在性在此条件下无法成为对话双方共享的信息（详见第178页）。实验结果表明，对话者在第三种条件下进行的观点采择最为准确迅速。换言之，即使客体的身份不是对话双方共享的知识，双方仅仅共同认知到客体的存在性，听话者也会被自我的知识所干扰。这一实验进一步证实了共同基础在语言理解中的作用。

与实验一和实验二中人为地操纵共同基础相比，实验四能够更自然地模拟日常对话的真实情境。实验一和实验二强化了说话者的身份

和听话者自我知识之间的联系。现实中这种情况只存在于巧合中，因为说话者往往不知道听话者自我的知识，不会谈及这些信息，也无法与这些信息产生关联。但是实验四告诉我们，在对话过程中，双方共享的注意水平会影响我们的观点采择。当双方共享的注意处于最低水平时（例如，当对话者身处两个不同房间的时候），人们会尽量少地考察自我的知识；相反，当双方存在高水平的共享注意时，对话者更容易产生错误的观点采择。

综上所述，本研究探讨了影响观点采择的两类社会认知加工：共同基础和心理理论。共同基础的加工是对话者通过自动化的联合注意，激活记忆中相关联的信息。利用这种加工，对话者不需要对对方的心理状态进行复杂的推理，即可快速自动地理解语言。我们的研究通过三个眼动实验（实验一、实验二和实验四）证实了共同基础在对话加工中的作用。其次，心理理论的加工是对话者通过对对方心理状态进行推论，将自己和对方的心理状态进行区分，从而建立起共享信息体系。本书报告的第三个实验发现，听话者对说话者的心理状态做出的推论影响了他们在理解对话时对信息的利用。实验三不仅证实了心理理论的作用，还发现其作用时间处于语言理解的极早期。这意味着对话者可能无须对方心理状态进行无限推理，其心理状态的推论可能和共同基础一样，都是快速自动地进行的。最后，本研究尝试建立了语言加工过程中观点采择的认知模型，即，在对话过程中，双方的联合注意会激活过去的相关经验知识，同时双方也会推论各自拥有的经验知识。当二者提取的信息保持一致时，语言交流会迅速且顺利地进行；而当二者作用的结果互相违背时，对话者则需要耗费更多的认知资源以寻求更合理的解释。

本研究提出的观点采择模型综合并完善了以往观点采择加工的认知模型，既对认知加工成分进行了更细致的区分，也解释了长期以来对观点采择早晚期的争论。同时，我们还讨论了过去的研究在实验操作上带来的研究结果差异，解释了我们的实验研究如何避免了这些问题。比如，实验变量的设计和眼动数据的分析都会影响对结论的解

释，但是也正是通过研究者们对实验设计的不断修正，观点采择的加工过程才逐步明晰化，我们才得以对人类的日常对话运行机制及原理有了根本性的认识。

郑小蓓

深圳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

2016 年春